



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

四

接上期

二、“文革”死里逃生”

“文革”期间我曾经在批斗中被打断了两根肋骨,有两次在几秒钟之内,就能决定我的生死,结果我还是活下来了,作为一个“右派分子”,在“文革”中我是哪一派都不能参加的,但这也逃脱不了被专政的命运,两派中的一派把我拿出来游街,并把我关押在单位内,不准自由活动。其他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游街帽子是六十到八十公分高,我的帽子有一米高,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“右派分子——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”,游街时沿途不断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谩骂和攻击。

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,就逃跑了。当时我和我爱人还没有结婚,她在鹿寨县插队。



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只有到鹿寨县去找她。可还没有找到她就被当地农民发现了,他们把我抓起来,用手指粗的麻绳绑了我一天一夜,到现在我手上还有当时被捆的痕迹呢。第二天我被拉出去示众。那次批斗非常危险,我差一点就被打死。为什么没有死成呢?我爱人得知我去找她的消息后,马上跑到鹿寨县武装部队报告,说石琪高是个归侨,被造反派抓了,被打得很厉害,有生命危险。武装部的政委亲自赶到现场,制止了造反派的施暴,把我给救了。如果我爱人带的人再晚几秒钟到,我可能真的就被他们打死了。

那次没有打死我,但打折了我的两根肋骨,我的牙齿也被打掉了4颗。即使把我打成这样,造反派也没有放过我。他们把我从鹿寨县押回了柳州市,我被蒙着眼睛关在市委礼堂里整整42天,这42天真

是无法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,那真是叫暗无天日啊!是什么布蒙着眼睛 我都不知道,就这么蒙着眼睛躺着不准起来,想解大小便要报告,然后由一个打手拿着棍子带我到厕所,眼睛依然被蒙着。吃饭时蒙着眼睛坐着吃,吃完躺下,眼睛还是蒙着。吃的东西就是一顿饭、一个菜,我数了数,菜里最多只有12粒小豆子,一天就一顿饭,根本就不吃不饱。造反派就这么做,就是给你点吃的,保证死不了让你活受罪。“文革”中我可受了大罪,有很多故事没有时间,去讲。

三、首位华侨市长

我这个“右派分子”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当上了柳州市的市长。1983年广西党委对柳州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,我和田民搭档,他当书记,我当市长。20世纪80年代初“右派分子”当市长的情况,在全国我是唯一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我

很快就被摘掉“右”派的帽子。1958年2月4日我被拉出来批斗,8日被戴上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庆的那一天我就被摘帽了。那个时候摘帽的不多,我之所以能被摘帽,主要是因为表现好,劳动积极肯干、开会主动发言、能安分守己地改造。当年和我一起摘帽的有十几个人,其中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,他是位作家,叫秦兆阳,《前进在田野上》这本小说的作者,他在柳州机械厂劳动,我在柳州市市政工程处劳动。”

1986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,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我,写了一篇题为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文章在“人民日报”海外版上发表,这个题目出自唐诗。在私下与我聊天时这位记者说我能当上市长有三个突破:一是“右派分子”平反后能当正职领导职务的在我之前没有,不论职位高低都只能当副职;二是归侨领导干部通常都是副职,我能当上正职也是一个突破;是我从正科级干部一下就提升为正厅级,这又是一个突破。当市长之前,我在柳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上班,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建筑公司,后来被提升为副经理也只相当于正科

级,1983年直接被提为柳州市市长,提升跨度之大在此前是没有的,我算是“坐火箭上来”的干部。从那以后,这样的事情也没有3,我算是空前绝后。

社会普遍认为,当官能当到市长这个份上的人总有点背景,要么是老红军的后代,要么是其他什么条件……,一个归国华侨怎么能当上市长呢?在当时那种社会舆论背景下,很多人对我当上市长的事很不理解。于是,有人找当时重用我的田民书记,问他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。他回答道:“我就是专门要用那些有能力的“右派,分子。”在他看来,当年被打成“右”派分子的人,有一部分是精英。3除了我,他还用两个“右”派分子当厂长。我被市委领导发现是在柳州市“群英会”上,柳州市每年都要召开表彰先进工作者大会,也叫“群英会”。我曾经四次代表市建二公司出席大会,我的事迹市领导也因此都知道了。市领导看我是个归侨,又曾经被打成“右”派,就非常关心我。当时柳州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叫欧济文,延安抗大出身,我当市长就是接他的班,是他最初发现了我,他曾专门派人去看我。当时一家50人只住在一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

